



我教通識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發起在全港18區步行來爭取普選，及呼籲市民在6月22日投票。他每天朝早8時至晚上8時，每天約走20至25公里，中間設有休息及用膳時間。他在退休前及退休後皆對政治顯出極度關心，往往令人誤以為他是一位政治領袖，而非宗教領袖。其實，他的所作所為除了是個人抗爭的性格使然外，亦是「實踐」着羅馬天主教會在二十世紀所提倡的解放神學精神。

自二十世紀開始，第三世界的天主教會愈來愈激進，部分神職人員更認為，教會應該全面介入政治，甚至領導國家。在羅馬的天主教廷，自第二次梵蒂岡會議（1963–1965）之後，各種解放神學廣為盛行。至少有一段時間，教廷容許神職人員參與激進的政治行動。1967年，教皇保祿六世在其通諭

中呼籲教徒應該「大膽轉化」全球財富分配不公的現象。教會反對高壓政權，既是權利也是義務。神職人員的政治積極主義在《聖經》中找到先例支持，他們視《出埃及記》為一部奴隸的解放史，又以阿摩斯（Amos）一類的先知為執行正義的榜樣。解放神學以不同的形式鼓勵信徒投入政治鬥爭，清楚表明教會不再是站在當權者一邊。

天主教的激進派在1960年代中期，變得具有更強烈的政治傾向，有一些甚至全心期待革命的到來。在亞洲地區，神職人員積極介入政治運動，大大提高了教會的威望，而這種威望又會反過來助長教會的政治實力。菲律賓的天主教會一直活躍於社會的議題，樞機主教辛海綿在推翻馬科斯的革命運動中大出風頭。新政府成立以後，教會領袖通常會希望國家承認他們的特權，甚至希望可以分享政府裡的職位。

只為提升教會影響力

由此可見，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積極參政，實有以下的兩大目標：（1）反

對高壓制政權，爭取人權；（2）加強教會在政府及社會上的影響力。觀乎陳樞機熱心政治行為的動機，理應不是前者，而極大可能是後者因素所促成。

回歸十七年以來，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但亦不至淪為一個壓逼人民的政權，而且施政上的失誤，實有制度上的因素（有神學家稱為structural evil），例如行政與立法之對立，引發了議員的「拉布」、議員對官員的喝罵（叫官員下地獄、灑溪錢），這些才是「暴民政」（可稱為personal evil），侵犯人權，但從不見陳主教作出指控及糾正。

可見，本地某些神職人員透過參與政治活動，其動機可能是為了加強教會的影響力。例如菲律賓天主教的樞機主教辛海綿正是由於參與政治運動，大大加強了教會及個人在菲律賓事務上的影響力。但如只是為了教會發展及個人聲望而抗爭，則已失了為人民福祉服務的精神，同時亦已失去了解放神學的核心精神。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考察筆記

早前，古物古蹟辦事處建議將大坑蓮花宮、鴨脷洲洪聖古廟和九龍城侯王古廟，列為法定古蹟。在這三間廟宇中，以大坑的蓮花宮最有特色。

蓮花宮約建於1863年，至今已逾150年歷史。興建廟宇的原因主要有兩個說法：其一，在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發生了太平天國事件，不少人為逃避戰亂而遷居香港。他們移居到香港，興建了蓮花宮，藉以在陌生的環境中有所寄託。其二，有傳言是觀音曾在廟宇所坐落的巨石上顯聖，善信遂建廟以資紀念。

廟宇落成後，一直是區內的主要廟宇。到了1950年代，蓮花宮一帶來了不少南來的難民，加上原住在這裡的貧民，建成

大坑蓮花宮

了一個大型的木屋區，區內的品流越來越複雜、衛生環境也很惡劣。為了改善廟宇的管理，於1975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接手管理。

外觀呈八角形

富有傳統中國的建築風格的蓮花宮，外觀呈八角形，有別於傳統的廟宇建築。加上廟宇的大門位處建築物正中，但不是廟的入口，入口處卻在建築的兩側，其建築特色可算是別具一格。另外，廟宇的底部及兩側皆設有水池，令建築物猶如蓮花浮在水上。然而，於2001年，蓮花宮發生大火，在火災後水池才被填平。

蓮花宮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區內文化的中心點。其中，最為市民所認識的，就是大坑舞火龍。在每年的中秋節，大坑都有舞火龍的儀式，而火龍就是在蓮花宮出發。

考察重點

1. 蓮花宮有不少宗教活動，其中有以列入國家級文化遺產的大坑舞火龍最為人所熟悉。同學可在中秋節到訪蓮花宮，認識這個香港傳統的節慶。

2. 蓮花宮的設計是獨一無二。廟的前半部位於一個平台上（原是水池）；而廟的後半部則坐落於一塊巨石上（又稱蓮花石）。同學到蓮花宮考察時，可留意這座廟宇的設計。

3. 同學可分析蓮花宮在列入法定古蹟後，對市民認識區內的歷史文化，有多少的幫助。

考察貼士

1. 蓮花宮是由華人廟宇管理委員會管轄的廟宇，有關蓮花宮的資料也可以瀏覽委員會的網頁，網址是：<http://www.ctc.org.hk>

2. 廟宇的開放時間是每天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

香港歷史文化探索者 徐振邦



▲蓮花宮的外觀特別，是香港其中一座富有特色的廟宇



通識教室

通識課程改革狂想

聞傳媒看到有關中東的以巴衝突又是什麼？恐怖主義對世界有何威脅？這些都是作為世界公民的基本認識；筆者甚至認為，對於國際關係缺乏認識，全球化也無從說起而變得空泛；不了解國際話語權的運作，能源科技與環境中也難以討論能源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另外筆者也覺得作為香港公民需要認識的，是其他國家的民主發展經驗。現時本港就2017普選的討論熾熱，但2017不論實行什麼普選制度，只代表民主化的開始。

民主如何透過公民社會發展而深化、發展期間會遭遇什麼困難或挑戰等々，對本港的政治發展都很有參考意義。例如西方的民主發展、台灣的民主經驗、泰國民主制度為何每多挫折等，其中涉及哪些概念和相關的例子都對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十分重要。

傳媒與生活息息相關

還有以往高補年代通識科中，香港研究單元的傳媒課題也是筆者認為值得列為課程重點的課題。其實在不少先進

國家的基礎課程中都設有「傳媒識讀」課程（Media Literacy）。傳媒一來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何理解傳媒怎樣傳意、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傳播價值觀等等，或者最低限度識別何謂好的或壞的傳媒或節目，都直接影響我們的社會與生活質素。

而且，修讀通識科真正需要使用大量的傳媒資料，例如剪報、新聞或紀錄片等等。如果學生懂得如何有效地接收及識別傳媒的資訊與價值觀，例如閱讀一篇社論應如何拆解其內容的概念、價值、資料、立場等，從而對比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及相關概念，有助學生更容易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以上的「建議」可算是狂想。因為現時課程改革的方向似乎以保留現時六個單元、再從中削減內容為主調，再加上新的課題恐怕會受千夫所指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通識課程以至我們期望香港的年輕人究竟該學習什麼，並隨時代轉變而不斷加以審視及發聲，對通識科來說相信是重要的。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賴得鐘



走出校園

仁大國文體現人文教育精神

想起我校創於上世紀70年代，其時正值「文革」肆虐、國亂無象，中國數千年禮義詩書掃地蕩盡，而殖民地精英教育又讓不少有志青年升學無門，胡校監、鍾校長伉儷乃毅然自資辦學，廣育英才，背後除了隱然以繼絕存亡自許，且抱有欲挽狂瀾於既倒之志節，令人欽敬。

推行經籍式文史教育

其實再細心一想，校內推行經籍式文史教育，正好體現辦學者的苦心孤詣，意欲綿延斯文未絕之薪火。是故規定大一國文必修，彷彿長輩在叮嚀一衆

長於殖民地的樹仁諸生——寄語他們究心現代知識之餘，也不要忘卻尋溯故國的文化淵源。

單是看看教材本身，已反映出選編者當年雖身處南海殖民之隅，眼見古今宇宙之奇變，但仍心存人文精神，其切望之情，溢於言表。教材及課程自創校沿襲至今，這種倡導中國經籍的教育理念，與時下一般院校開設的中文科目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社會長期重英輕中，今日工商界雖講求兩文三語，充其量也只是職業英文和商用普通話而已。

中文不好，已淪為全不重要，更遑

論懂不懂中國文化。其實，以最根本的國文「入藥」而教，方是學好中文的正途。本港中學中文科復設範文篇章在即，其實不妨參考我校的大一國文教材。

今天社會全盤西化，追求功利至上，其實文心凋零，又豈獨是古蹟文物之滅絕？筆者雖然所學皮毛，但仍特別珍惜修讀大一國文這份情懷，但願母校能夠永遠保持這一優良而獨特的傳統，更希望它能夠成為香港中文教育的典範。

（大一國文·下）

樹仁大學歷史學系三年級生 安立甘



編採速記

了解基本法 師生皆有責

一切源於《基本法》。這是特區政府宣傳片的文字，我認為是近年最鮮明到位的基本法宣傳片。

教育局上周公布新修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明確要求小學要教基本法，讓學生從小了解基本法這部香港小憲法以及加深理解「一國兩制」，進而建立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在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後，課程新指引的內容自然是引起關注，證明大家重視。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政府的國策，也是基本法的概括。因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原有法制、生活方式不變，有別於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人無須服兵役，也不用向中央繳稅，中央政府負責香港的外交國防事務。但這只是基本法一百五十多條條文的部分章節而已，但回歸十七年來，政府文宣、社會輿論以至學界關注幾乎只集中於此，至於作為特區政府義務的「自行」為關乎國家安全的廿三條立法，則自2003年以來，從特首到普遍立法會議員，都避之則吉。這明顯是荒謬混帳，不可接受的。

只講權利 少談義務

有權就有責，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政府、民衆各項權利，也有相應的義務。但十七年的現實是，人們習慣於只講權利，少談甚至不談義務。這從一段宣傳片可見，一家四口行山，男孩滿腔熱誠想參軍，家長告之港人不用服兵役，然後一家人好滿足了。能不能想深一層，作為國民分子，不用參軍也許是一種幸運，從另一角度看是不是遺憾呢。我認為，師生不妨就此討論。

多看看基本法條文，多翻翻有關白皮書，自會對香港的角色、與國家的關係、自己的身份以及責任，多一些了解，多一些思考。沒有國家的強大，香港特區護照何來百多個國家簽證待遇？沒有一國兩制的國策，香港何以享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要成為公務員，必須通過基本法考試，要善盡公民職責，不可能不熟悉香港基本法。這是學生必修的通識課，也是港人必讀的小憲法。

呂少群

新港人先鋒

走遍世界 最愛香港



朱君璞（左）說，香港是一個最公平的地方，只要你努力便會更容易成功。

「新紫荆廣場」節目之《新港人的先鋒》，逢周二上午11點播出。

脊骨醫生朱君璞（Eric）天生一副孩子臉，總是笑瞇瞇的。Eric在台灣出生，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台灣人。他讀完小學之後移民加拿大讀書，又去美國修讀了博士學位並且工作。在2003年的一次偶然的機會，Eric來到香港參觀了本地的一些醫療機構，一位老醫生對他的一番話，讓他毅然決定放棄在美國的事業，選擇來香港發展，沒想到一來就不走了。

從小經歷了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洗禮，長期在美國和香港兩地的生活閱歷，使Eric對這兩塊地方有着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坦言，儘管現時社會上很多人對美國充滿嚮往，懷揣對美國的熱情，但他認為香港社會的自由和平公正是高於美國的，而這也正是他選擇在香港生活的原因之一。Eric認為，在香港，只要你有能力，比別人付出更多努力，你就一定比其他人更容易獲得成功。

子矜：當時你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學習生活有什麼不同？

朱君璞：因為我在加拿大長大，接受了一些加拿大文化，所以到美國唸書並不會有太大文化方面的隔閡。但我記得我在讀博士的時候當時的導師跟我說，首先你是中國人，所以你將來看病人時候跟其他醫生相比有一定的劣勢，普通的市民大眾還是會更相信白人。其次我的身體比較瘦小，也是班中最年輕的，也比較難獲得病人的信任。當時在美國自己也要打工賺取生活費，找了一個待遇很好的工作——去殯儀館幫人洗屍體，每天一百美金，但是也沒有什麼人願意去做，因為我是醫生，所以不會太排斥，也因此掙到不少零用錢，供給自己在美國的生活。

子矜：那你之後為什麼會離開美國到香港來發展？

朱君璞：2003年我來香港換領身體證，當時就順便參觀了一些脊骨科方面相關的醫療機構。當時香港的一些脊骨科醫生非常歡迎海外的華人醫生回來執業，當時的一位老醫生跟我說，美國和加拿大有很多的脊骨科醫生，而當時香港只有60名脊骨科醫生，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如果像我這樣的人回來肯定可以幫到更多的人。後來經過一段時間考慮，我決定賣掉了在美國、加拿大的房子和車子，來香港發展。來香港之後我發現，香港是一個最公平的地方，也是一個你努力會更容易成功的地方。香港人都有國際觀，而且如果以競爭來說，香港絕對要比美國要公平。在香港，只要你夠分數，你進港大的機會和李嘉誠兒子是一樣的，但在美國，富豪孩子進哈佛的機會絕對要比你大得多。

徵稿細則

《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詳情如下：

- 第二版「事事關心」乃一時事平台，歡迎師生發表意見；800字為限。
-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與生活、通識教學、教育育人的經歷感受；700字為限，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包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及電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tkpschools@gmail.com